

宋庆龄基督教思想之演变

朱玖琳

《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7期

宋庆龄与基督教的关系错综复杂。她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家庭，丈夫孙中山亦是一个热爱耶稣的人，按说她也应该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她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否认自己与基督教有关，甚至多次说明孙中山也早已脱离基督教，晚年却又承认基督教教义对她的影响。于是研究者采取了折中的方式，既认为宋庆龄至少在二十岁以后就不再信基督教了，但她的思想中仍有基督教教义的残留。研究者表述了结果，而未能详叙其基督教思想演变的过程，对其演变原因也未加全面分析。

宋庆龄的生平具有如此特殊的宗教背景，她的宗教思想绝不可能突变。事实上，宋庆龄基督教思想转变的过程是漫长的，有阶段性的。本文试图从基督教教义及其社会功能、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等诸方面入手，分析基督教对宋庆龄人生道路的影响，以及宋庆龄从信仰上帝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及原因。

一、“从基督教教义这个根子上发展到革命”

宋庆龄出生于一个不仅有着显赫宗教背景，而且又带有浓厚革命气息的非同一般的基督教家庭，正是这样一个特殊家庭使她生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徒，并“从基督教教义这个根子上发展到革命”^①。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出生于基督教世家，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宋氏家族成员曾一再向人提起徐光启是他们的先祖，并以此为豪。在基督教传华史上，徐光启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是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名列中国基督教“三大柱石”^②之首，曾挺身而出遭到众多官绅非难的基督教。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是耶稣会士利玛窦“补儒易佛”思想的理想实践者。他还与利玛窦等传教士一起研习欧洲近代科学，翻译编撰科技著作，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功不可没。徐家世代信奉天主教，宋庆龄的外祖母徐氏因丈夫倪蕴山是基督教新教伦敦会牧师，遂改奉新教。

^①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

^② 其余二人为光禄寺少卿李之藻和监察御史杨廷筠。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则是以一种离奇的方式认识了上帝，并成为上帝的子民。宋嘉树在美国皈依基督教后不久，便就读于范德比尔特神学院专修神学，毕业后被监理会派回中国传教。宋嘉树回到自己久已陌生的祖国后，所见及所遇令他颇有失意之感。由于文化上的激烈冲突和习俗上的强烈差异，在欧洲为立国之本的基督教在中国却既为官绅所鄙亦为百姓所恶。19 世纪中叶，基督教在经历了百年禁教的厄运后，跟随列强的大炮重又进入中国。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部分传教士和教民专横跋扈，横行乡里，使民众的仇教心理逐渐膨胀，教案迭起。宋嘉树在乡间传播福音根本就不为乡民接受。由于久居异乡，宋嘉树一方面因言谈举止西化而被同胞视为异类，另一方面因没有国学功底又在教会内部受到歧视。这种不中不西的身份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

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道成肉身降临人寰，“以其清白之身来替罪孽深重的世人代为受过，以自我牺牲来换取人之得救的希望与可能。”基督为世人而活，宋嘉树要为同胞而活。他曾说：“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活着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①但要把光明带给受苦受难的同胞，单纯的布道工作显然难有作为。他对挚友步惠廉说：“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摆脱布道工作，我能为我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②

宋嘉树最终退出了布道团，但仍保有传道证书，并继续为教会服务。他将精力逐渐转到实业上来，表面上他“从事于教会及实业”，暗中“则传革命之道”。^③结识孙中山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救国理想使他们很快成为“同志和朋友”。他建议孙中山发起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他在自家的印刷厂里为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并在经济上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每次秘密回国，途经上海时“必然住在”^④宋家，并在宋家与同志秘商革命。

宋家浓厚的宗教氛围，使宋庆龄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一样自幼沐浴在上帝的光环之下。母亲倪桂珍每日举行家庭祈祷，送子女到主日学

^① James Burke, *MY FATHER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INC., 1942, p.11.

^② James Burke, *MY FATHER IN CHINA*, p.54.

^③ 《致李晓生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342 页。

^④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 年第 5 期。

校接受宗教文化教育，并要求他们去教堂听冗长的讲道。在童年的宋美龄眼里，家庭祈祷使人厌倦，教堂说教则冗长无味。^①对幼儿而言，这是很正常的，但童年宋庆龄的表现却超出了她的年龄。她不仅专注听讲，而且还勤于思考，并提出疑问，曾因此而被年幼无知的宋美龄误会为不忠实于信仰。据说，童年宋庆龄曾在听完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奇迹后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但她仍然要像基督所做的那样，为别人而活。^②

在基督教中，善是上帝的恩典，行善的目的是见证上帝，而不是有求于上帝。信、望、爱是基督徒必须具备的三大美德，“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③爱人是爱上帝的表现，基督徒要爱人如己，还须像爱他的弟兄那样爱他的敌人。宋庆龄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倪桂珍救助贫困乡间妇女的善行，多年之后一直为人称道。^④宋庆龄自幼就在父母不求任何回报的善行中，体悟基督教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博大的爱。

宋家神秘的革命气息是将宋庆龄引向革命之路的原始圭臬。基督教“牺牲自我，成全别人”的悲剧性意识在宋家表现得特别强烈，宋嘉树之于革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基督教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具有同样宗教情怀的倪桂珍亦不顾革命可能遭来的杀身之祸，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协助丈夫“资助革命事业”。^⑤在父母尤其是父亲宋嘉树的影响下，辛亥革命胜利后，远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宋庆龄特意著文，歌颂辛亥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每个人的两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认为“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⑥

在西方，基督教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着调整，近代资本主义正是高举宗教改革的大旗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然而中国政治并不像西方政治那样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中国长久以来都是以人治

^① 宋美龄：《我的宗教观》，《美国论坛》1934年3月。转引自：何虎生主编：《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下册，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526页。

^②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30页。

^③ 《哥林多前书》13：13。

^④ 见 Elizabeth Claiborne, “Mrs. K. T. Soong—Her Day,” *The Missionary Voice*, 1December, 1931, p.586. 转引自 Elmer T. Clark, *The Chiangs of China*, Nashville: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43, pp.40-41.

^⑤ 见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上海宋庆龄故居馆藏《宋母倪太夫人讣告》。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国，“神”根本没有能力影响“人”的国度。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了，但自由和平等对绝大多数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字眼，中国的共和事业不久又重遭挫折。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宋家正因“二次革命”失败而与孙中山等人一起流亡日本，宋庆龄带着欧美华侨托付她转交孙中山的一箱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来到日本。因为父亲与孙中山的关系，宋庆龄继姐姐宋蔼龄之后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二、“不是属于教堂的基督教徒”

耶稣被犹太上层以“谋反罗马”之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人认为耶稣是带领下层犹太人民反抗罗马和犹太上层统治者的革命者。孙中山亦持此观，他的那句“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样”^①的名言被研究者反复援引。

1915年10月，宋庆龄不顾一切地去日本嫁给了“同耶稣一样是革命家”的孙中山。宋庆龄的父母极富基督教“舍我为人”的奉献精神，但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也牺牲自我，放弃舒适安全的生活，同孙中山一起踏上荆棘路。然而家庭和教会教育的长期熏染，早已养就宋庆龄博大的胸怀。自幼就表示要像基督那样为别人而活的宋庆龄，也同父母一样，极愿意为中国革命奉献自己。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绝不同于一般的爱情，因为她“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她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②婚后不久，宋庆龄在致友人艾丽的信中坦言自己是勇敢地克服了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的，她说：“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③

但是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不仅被孙中山的政敌横加诬蔑，同时也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教会指责孙中山抛弃发妻而与一个比他的年龄小一半的女孩结婚，认为他完全违背了基督教的道德。多年以后，宋庆龄回忆道：“传教士往往保守，不求进步。在那些年里在中国的传教士强烈地反对我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他们去找我的父母

^① 孙中山临终遗言。见《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1931年，第87页。

^②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③ 《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他们是虔诚的卫理公会[监理会]教徒），说明他们的看法并试图劝说他们把我从日本追回来。”^①此前，孙中山从事革命之秋，“教会惧其波及”，宣言去之。孙中山因而愤言“是教会去予，非予弃教会”^②，故不再进教堂礼拜。他常称自己“不是属于教堂的基督教徒，而是属于耶稣的基督教徒。”^③教会的二次非难，使宋庆龄与孙中山一样从此不再进教堂礼拜。

因为宋庆龄不去教堂，当时的传教士认为她不是基督徒了，^④宋庆龄传记的权威著者爱泼斯坦先生也认为从此宋庆龄和孙中山同神学分手了。^⑤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突变似显唐突，欠缺合理解释。事实上，宋庆龄虽然和孙中山一样不再进教堂，但也和孙中山一样没有因为教会的非难而放弃信仰。孙中山曾解释他虽然离开了教会，但仍然是基督徒，教会去他，“不当在教会，但非教义不足贵也。”^⑥

教会的非难的确是宋庆龄和孙中山不再进教堂的直接原因，但这其中也夹杂着其他一些主观因素。一方面，宋庆龄与孙中山一样，其基督教思想更接近于强调基督教作为道德宗教帮助社会改良的社会福音派，而非保守的单纯追求个人属灵得救的基要主义派。因此他们重视基督教追求至善境界的道德理想，但不在于其神学内容和教堂礼仪。另一方面，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使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洗礼的孙中山一度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而这又直接地影响了宋庆龄。孙中山曾将自己阅读的怀特的《基督教领域里的科学与神学之争》、尼采的《上帝之死——反基督》和柏格森的《生元有知论》等书转交宋庆龄看。^⑦当宋庆龄告诉孙中山，她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生们就被赶到教堂去做礼拜，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明确告诉她，“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⑧关于孙中山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冯自由的评价为：“考总理之信教，

^①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 903 页。

^②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66 页。

^③ 夏曼著：《孙逸仙传》，纽约 1934 年版，第 310 页。

^④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第 100 页。

^⑤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0 页。

^⑥ 《孙中山集外集》，第 266 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 489 页。

^⑧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 652 页。

完全出于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与世俗的墨守旧章思想陈腐者迥然不同。”^①孙中山不信仰神化的上帝，但崇信作为救世的革命者的耶稣。宋庆龄将孙中山视为自己的老师，孙中山这种独特的信仰方式，对宋庆龄的影响是巨大的。宋庆龄生于虔诚的基督教徒之家，婚前一直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她始终被教导不可怀疑上帝的绝对权威。在丈夫的宗教世界里，宋庆龄却看到了另一个耶稣基督。孙中山虽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却为宋庆龄打开了一扇通向唯物主义的窗户。

1922 年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并从非基督教蔓延到非所有宗教，这一运动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最大的非宗教运动。与以往纯粹排外的反基督教运动不同，这次运动有着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统治的色彩，中国基督教被视为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洋教”而遭鞭挞。事实上，教会人士对自身因“洋教”性而受排斥早有认识，宋庆龄父亲宋嘉树就是最早的有识之士之一，他于 1902 年参与发起了上海第一个基督教自立组织“中国基督徒会”。^②身为基督徒，孙中山也认为“教会在现制度下，诚有不免麻醉青年及被帝国主义者利用之可能”，但他反对非基运动全面否定基督教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当进行改良，“谋独立自主，脱去各帝国主义之羁绊”^③。

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教气氛亦十分浓厚，其中不乏邹鲁、汪精卫、廖仲恺等要人，“南方广东政府中的人们，在政治倾向上虽有左、右之分，但对非基运动却表现出相当一致的赞成态度。”^④1925 年 3 月孙中山弥留之际，非基运动正处高潮，孙中山十分担心党人因宋庆龄的基督教徒身份对其不敬，特嘱国民党各领袖，他死后，切勿因宋庆龄的基督教徒身份而为难她。^⑤孙中山身后，1926 年 1 月，宋庆龄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青年运动报告决议案》明确规定：“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与教会学生联合，不应站在反对宗教的观点上与教会学生分离。”^⑥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2 页。

^②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1 年，卷十一，贰：92。

^③ 《孙中山集外集》，第 266 页。

^④ 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18 页。

^⑤ 见《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1931 年，第 87 页。

^⑥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第 133 页。

三、“如果他（蒋介石）也算是个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

1927年至1931年，宋庆龄流亡海外，先后生活在苏联和德国，间于1929年短暂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4年的流亡生涯是宋庆龄一生中政治思想转变的关键期，她逐渐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①宋庆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无疑也影响了宋庆龄对宗教的看法。

宋庆龄在海外流亡的4年里，因为她“是国际工人救援组织的中央委员，她在中国的国民运动中站在共产党一边，并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士保持密切的关系”，故受到德国当局的严密监视。^②在欧洲，她很少与外界接触，或与邓演达等研讨工农问题，或到图书馆去潜心读书，整日“沈缅于书籍之中”^③。回国后，从30年代初期宋庆龄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等重要文章看，“她已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 and 论述。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从政治的角度，从意识形态领域出发，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阶级分化，在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痹被统治阶级，私有制被消灭之后，宗教也将随之消亡。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一切宗教持否定的态度，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核心，因而也遭到主张不分阶级、不分敌我以求“博爱”的基督教会的反对。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之间似乎是对抗的，西方教会因此而与蒋介石政权达成共契，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宗教政策也规定对一切宗教尤其是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基督教予以沉重打击。

宋庆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赞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① 《国之瑰宝——宋庆龄的思想与实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② 德国国家公安监察委员会主席1928年5月5日给普鲁士州内政部的指示。转引自：刘家泉著：《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第55页。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14日。

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她还没有完全放弃上帝，但是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说影响，她心目中的上帝形象又有了变化。

宋庆龄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当她听到妹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消息时十分气愤，认为“这一婚姻的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①1930年蒋介石实践婚前对妻子的诺言，在宋美龄的搀扶下进教堂受洗，皈依基督教。与宋庆龄和孙中山不同，宋美龄和蒋介石极注重形式。蒋介石不仅每天读圣经，为方便礼拜，他还用公款在各地建了许多“凯歌堂”。每逢星期日，夫妻俩的身影必于上午10时左右出现在“凯歌堂”内。但正是这样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甚至无辜群众大开杀戒，遇害者中包括邓演达、杨杏佛等曾经与宋庆龄亲密共事的同志。1932年6位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年作家遇害，宋庆龄愤怒地对美国作家斯诺说：“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埋了。显然，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哩。”《哥林多书》痛斥派系纷争，宣扬博爱。蒋介石自称基督教徒却无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博爱，宋庆龄对此十分不齿。传教士对宋庆龄不去教堂礼拜，但心存信仰的方式不认可，相反，却因为蒋介石“每天读圣经”、坚持进教堂礼拜而确认他为基督徒。宋庆龄厌恶蒋介石政治流氓的行为，不愿与之为伍，她在政治上宣布与其分道扬镳，在宗教信仰上亦如此。她说：“如果他也算是个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②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说影响，宋庆龄心目中的上帝形象又有了变化，上帝不仅是革命的，他对不同的人也是有分别的，他不会接纳蒋介石之类的“反革命”。正如斯诺而言：“没有哪一部圣典会规定‘反革命分子’不能当基督教徒。佛朗哥以及在他之前的许多暴君还不都是基督教徒吗？但是，在宋庆龄看来，没有一个‘反革命’能进天国之门——即使是孙中山守门也不行。”

宋庆龄并没有因为蒋介石而放弃基督教，她依然在心中信仰她自己心目中的上帝。综观目前已知的宋庆龄的各种言论，50年代以前的她从未对基督教有任何微词。她认为正是在信奉基督教的妹妹的影响下，婚后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真心相爱了。“美龄真心爱蒋介石，蒋

^①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第100页。

^②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第103页。

介石也同样爱她。没有美龄，他也许会坏得多。”^①蒋介石、宋美龄在30年代大搞新生活运动，宋美龄宣称：“新生活运动适合于新的潮流，与基督教救世救人的目标相一致。”^②而基督教会也积极参与新生活运动，并因此而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宋庆龄撰文指责新生活运动时，指名道姓地批判了儒教，但只字不提基督教，给基督教会留了面子。

四、“我不是一个基督教改革者”

在斯诺的眼里，宋庆龄并不像传教士认为的那样放弃了上帝，而是一个对上帝有着不同理解的基督教徒。但是，50年代的宋庆龄却对此矢口否认，她认为斯诺：“错误地引用了我的话，把我描绘成一个基督教的改革者，而我不是的。”^③

1959年10月，宋庆龄在致贝特兰函中否认自己是基督教徒，称斯诺错误地引用了她的话。^④1966年4月1日，宋庆龄在致爱泼斯坦函中进一步否认了孙中山的基督教徒身份，明白表示他们俩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⑤50年代起的宋庆龄彻底否定基督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重点是使中国的外来宗教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国基督教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自养、自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1957年之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号召下，宗教被当作“精神麻醉剂”、“鸦片”受到严厉批判。1958年提出的“与传统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和“与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的口号，成了消灭传统宗教的理论依据。以后斗争形式逐渐升级，“四清”运动把对宗教的批判延伸到对信徒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高潮——消灭宗教。

在这样的大势下，宋庆龄的宗教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在上海宋庆龄故居藏书目录中，宋庆龄在这一时期的哲学类藏书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的书籍，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大纲》（1950年版）、《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1951年版）、《唯物论的历史观》（1951年版）、

^①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第101页。

^② 转引自《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7页。

^③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573页。

^④ 见《宋庆龄书信集》下，第573页。

^⑤ 见《宋庆龄书信集》下，第652-653页。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1954年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1955年版）、《唯物主义史论丛》（1955年版）、《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书的讨论》（1956年版）、《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1955年版、1956年版）等等。显然，宋庆龄正在通过学习，自觉地将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清除出去，与上帝作彻底的决裂。这一决裂的后果就是她对自己曾经的基督教徒身份的否定，乃至对孙中山基督教徒身份的否定。

宋庆龄绝不是一个迫于形势的人，在致贝特兰函中她特别提到了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和写作的鲁迅，并说：“如果你妥协，那将置你于各种危险的境地。”^①宋庆龄热爱新中国，也热爱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经历了洗脑般的大量阅读后，她的确已经在思想上认为宗教是唯心的，是落后的。另一方面，她认为将她描绘成一个基督教徒不仅对她也对中国“既不诚实也不友好”。所以，当一个对新中国怀有敌意的《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福竭力想要宋庆龄承认自己还是一个宗教信仰者时，宋庆龄为了澄清事实致函爱泼斯坦，否认孙中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50年代以后，宋庆龄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同上帝彻底决裂了，但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牺牲、宽容等精神早已深深地浸润在她的骨髓中。晚年，她坦言：“在我头脑中，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

“博爱”曾经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精神鸦片，但宗教的社会作用是一个变量，“博爱”精神在和平时期重又确立了它的正确性和重要性。1980年，宋庆龄要求邮电部把孙中山手书“博爱”两字制成一种邮票，“因为我们再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和平及对人类的爱。”^②

中国在经历了长期而又痛苦的“阶级斗争”后，终于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宗教政策趋向客观，宗教不再被认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说过：“只有当实际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

^①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573页。

^②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872页。

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很显然，马克思也承认宗教之存在是人类的精神需要。消灭私有制并不代表宗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极明白而合理”，如果人能超乎一切，上帝倒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上帝。宗教绝不是落后的唯心主义，我们应该抛弃从意识形态看宗教的传统观念，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宗教。所以，当我们偶尔在宋庆龄晚年的书信中发现她有祈求上帝的字眼时，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用“天帝”来加以掩饰。